

闽西苏区红色体育文化实践及价值探析

刘冷珊,王念龙

(集美大学体育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各时期都十分重视体育工作的发展。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对革命时期闽西苏区红色体育文化实践进行梳理和分析。研究发现,闽西苏区红色体育文化实践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军事体育、学校体育、青少年体育、妇女体育等四个方面,其多样化体育实践为现代体育工作开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价值与当代国防教育目标相符合、与当代立德树人目标相契合、与当代全面发展目标相切合、与当代社会价值目标相贴合。

关键词:闽西苏区体育;红色体育文化;红色体育实践

中图分类号:G 8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413(2023)02-0040-07

Study on the Practice and Value of Red Sports Culture in Minxi Soviet Area

LIU Ling-shan, WANG Nian-long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1921, all periods hav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Using the literature material method and field survey method, this study aims to comb and analyze revolution Minxi Soviet red sports cultural practices. It found out that Minxi Soviet red sports cultural practic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ur aspects of military sports, school sports, youth sports, women sports, whose diversified sports practice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Besides, its value accords with the goal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the goal of moral education, the goal of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the goal of social value.

Key words: sports in Minxi Soviet Area; red sports culture; red sports practice

红色体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政治内涵,内含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种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文化,是一种新型的、有着鲜明特色的文化元素。^[1]红色体育文化实践是红色体育文化的内容之一,是在革命战争时期(此处的革命战争时期具体指1927—1937年间的“土地革命时期”,后文同指)广泛开展起来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贴近军民生活、内容丰富多彩。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体育的政治性与工具性的特征一直是党和人民军队的关注重点,闽西苏区在党的领导下,着重培养与发展体育,并通过一系列体育实践,促使体育在闽西的革命斗争与教育改革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闽西政权组织分裂。同年9月,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部队南下闽西,恢复闽西政权体系,建立了苏维埃政府。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自井冈山全军入闽,解放闽西,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整顿、军事训练、土地整改,大力组织宣传工作,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闽西革命迅速发展。^[2]

闽西革命斗争的胜利,离不开党的领导,同时也离不开体育的发展。在救国强军的主要任务中,体育不仅是培养优秀红军战士的重要武器,更肩负着塑造铁一般精神的责任使命。闽西苏区红色体育文化实践内容与价值为现代体育教育提供了相应启示,对现

收稿日期:2022-07-18

基金项目:国家体育总局决策咨询研究重大项目——新时代我国体育发展基本理论研究(2022-A-03);集美大学课程思政教改项目(KCSZ028);集美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Z12158)

作者简介:刘冷珊(1997—),女,福建龙岩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王念龙(1973—),男,福建福鼎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文化、体育教学。(通信作者)

代体育教育的发展观念、教育思想、实践方式起着推动作用。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革命时期闽西苏区体育实践蕴涵的价值为研究对象,通过龙岩新罗、永定、上杭、长汀等四个县区

体育实践情况的收集整理,探究其价值,希望能对现代体育教育有所启示。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等电子数据库、闽西各县市图书馆、博物馆,查阅与革命时期闽西苏区体育发展历史及闽西老区体育传承现状等相关的报告资料、书籍文件以及相关论文,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表 1)。

表 1 图书文献

序号	图书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年份
1	苏区体育资料选编 1929—1934	曾飙	安徽省体育史志编辑室	1985
2	闽西苏区体育	福建省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 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华安印刷厂	1986
3	中国红色体育文化研究	党挺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7
4	中国红色体育丰碑	王增明、吉云波、徐国营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8

1.2.2 实地调查法

对新罗、永定、上杭、长汀等四个县区进行实地调研,获取本课题研究所需的相关信息(表 2)。

表 2 调研地点

调研地点	行政管理部门	调研时间
郭滴人纪念馆、邓子恢纪念馆、后田暴动陈列馆、龙池书院、龙岩一中	龙岩市人民政府	2021.12
永定县(永定区)土楼族群、东华山、永定一中	永定区人民政府	2022.2
上杭古田会议旧址、龙舟白沙河、上杭体育中心、苏维埃政府、才溪工会(列宁堂)、上杭一中	上杭县人民政府	2022.4
长汀县汀州试院、体育大厦、县体育馆、长汀一中、退役军人服务站	长汀县人民政府	2022.5

2 闽西苏区红色体育文化实践

2.1 军事体育实践

闽西苏区的军事体育以“人民性”和“军事化”为

发展首要核心点,目的除服务于政治外,也旨在增强群众的身体素质。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闽西苏区体育,其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增强武装力量。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地处山区的闽西苏区各方面条件较为落后,闽西地方部队欠缺完整、系统的训练,从内部凝聚力、管理体系及训练的系统性和规范性而言,相较中央红军差距太大,地方部队往往无法承受高强度的军事训练。群众间的体育意识尚未成型,间接导致闽西苏区群众身体素质较弱,无法给予中央红军强大的武装力量补充。^[3]

体育能够简单、快捷地引起人们的兴趣,党领导的红色体育具有高度凝聚力及快速而广泛的宣传能力。为巩固无产阶级领导,加强红军战斗力,塑造红军坚决的革命精神及积极的工作精神,闽西苏区建立了红军俱乐部列宁室,通过文化教育辅助政治教育完成其工作目的。而娱乐、体育作为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融入政治教育,以创造铁的红军为目的,这是中央政治教育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3]

1929 年红军第二次进入闽西,展开革命,正是这个时期,红军将中央苏区部分现代体育,例如游泳、足球、篮球、军事体操等项目及其活动规程、竞赛制度等带入闽西,一时间,体育热情高涨。但受当地山区地势影响,红军的工农革命速度并未很好地推动。苏维埃政府作出指示,整编闽西地方赤卫队和游击队划入红军,成为地方红军战斗力,由党中央统一领导。红

军的专业军事训练帮助地方武装整肃队风、思想,并提升其战斗技巧与身体素质,而游击队的障碍越野、地方武术、刀马舞等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体育项目帮助红军深入地方作战,进一步充实红军的革命力量。两方部队的结合一方面帮助闽西当地工农群众抗争资本主义,与国民党持续斗争,另一方面也使入闽红军与民众有了更深的接触和沟通,实现军民融合,极大增强了中央红军的武装力量。^[2]

2.2 学校体育实践

儿童是未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也是参加阶级斗争的新后代。^[2]

闽西苏区学校体育教育体系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建立的,以中央苏区的体育教育经验为借鉴,为教育组织机构、方针政策、师资培训、教材编写、教法革新等一系列工作,打下良好基础。闽西苏区较早实施义务教育工作,基本每乡建有初级劳动小学,每区建有高级劳动小学,其在着重德、智、体、美教育的同时,更从社会实践等方面培养教育学生,其高度的针对性和指向性,直接推动学校体育教育成为当时闽西苏区体育大环境下,发展脚步最快、制度基础最全、传播影响最深的体育体系。^[2-3]

在中央苏区的领导下,闽西苏区依照中央苏区体育教学模式复刻了建学标准,设立了多所初级列宁小学(“前期”三年)和高级列宁小学(“后期”两年)。最低限度保障室内、室外各有运动场所,在自制简易体育运动器材的基础上,尽可能购置足量价廉、实用的游戏器具,并起草《小学课程与教学草案》《竞争游戏》《少先队体操》等多种学校体育教材,保障学校体育实践工作的开展。要求儿童体育训练以军事训练为主,知识、技能、身体要达到能满足目前斗争和一般生活最低限度的需要。^[2]

根据当时儿童身心发展状况及体育敏感度,将8~14岁少年儿童的体育教学实践目标归纳为以下三点:(1)实物观察,实际行动;(2)创造活动,提高体育观念意识;(3)扩充知识,掌握生活必备技能。并以此为教学核心,在体育课程内容的安排上,遵循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的教学规律,利用单杠、吊环、秋千等设施开展普通体操锻炼,组织学生参与攀登、跳跃、赛跑、投掷等竞赛,教程简单,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增添运动多样性。掌握一定运动技巧后,在原基础上提升练习难度,结合军事训练计划,增加专业教学指导,例如投手榴弹、危机应对、刺枪、障碍跑及齐步、正步、跑步等队列队形变换的练习,注重实践教学,增加

军事化比重。^[2]

在战争的时代背景下,面临着敌人的随时入侵,学校体育往往是断断续续地开展,其中以野外活动居多。闽西苏区从小学开始便注重工农子女的身体锻炼,苏维埃政权下的学校体育强调少儿的启发式教育与自主的实践活动能力。在中央苏区记载的有关体育的文献资料中,所开展的青少年红色体育游戏活动共37种,闽西苏区保留下了13种,例如夺取南昌、节省粮食帮助红军、最勇敢的战士、冲破困难、伤兵互助竞赛等,每一种体育游戏的胜利对应着一句革命胜利的口号。^[2-3]

通过此类红色体育游戏,在革命时期,闽西苏区学校体育建立和规范了红色体育教育的长效机制,体现了其革命性、独特性、教育性及先进性特征。闽西苏区将实际斗争的教训和经验与教育相互作用,用以培养共产党革命斗争和闽西苏区建设的后备军。

2.3 青少年体育实践

闽西苏区的青少年体育在军事体育的影响下,建立了赤色体育组织,逐渐向青年军事化转变。赤色体育组织涵盖了“正式”与“非正式”团体组织,普及面广、组织独立,包括俱乐部、共青团、赤卫队、游击队、少先队、儿童团等。赤色体育组织上承红军部队,下接学校体育教育,进行一般的军事训练,具备一定的军事管理制度。赤色体育组织是不断吸收基层中优秀后备力量并将其培养发展为新一代革命力量的半军事青年领导集体。^[3]

早期国共两党因手段不同、注重点不同,吸收青年集体的结果呈现明显差异。我党重在关注青年参与体育所获得的自身利益,旨在普及并提高群众整体体质,而民族文艺、游艺与基督教宣传是当时“国统区”治理下资本主义吸收、扩大青年集体的“浪漫行为”,其展现的更多是爱好及观赏性价值,并无实际性意义。

我党半军事化管理突出了包容性特征,除每日会操、技术演练、定期检阅等军事训练外,更将体育与地方文化融合,开展军事晚会、体育舞蹈、教操、打拳、武术、越野、远足旅行等活动。同时,民间特色体育团体例如铁血团、拳术馆等,自发形成军事管理制度,并与红军合作开展群众武术活动,加强地方与军队间的沟通关系,激发青年群众的革命兴趣,将青年打造成党武装力量的“预备战士”。^[3]

2.4 妇女体育实践

“莫说我女人,我也要当兵,要革命,杀尽军阀与

敌人,革命会成功,政权有保证。”一句民谣不仅体现出当时的闽西妇女已具备强烈的革命意识,更体现出闽西妇女不弱于男子的革命气势和发自内心的保家卫国的革命精神。^[2]

闽西虽地处偏僻,但妇女运动渊源较早。1923年,借由上海“五四运动”的口号,许多在外求学的闽西学子,如邓子恢、章独奇、林仙亭等人,学成归乡后创办了《岩声》月刊,刊物上登载了许多有关解放妇女的报道。1926年《汀雷》报刊建立,公开揭露帝国主义的错误,宣传党的革命思想,注重对妇女、工人、商民、知识分子的宣传。1927年龙岩各界提倡男女平等,妇女有权参加政治及体育活动。1930年5月举行的区运动会是闽西苏区妇女体育的首次整体亮相,同时也是对妇女体育发展的一次检阅,推动妇女革命热潮,加快党在闽西苏区发展体育的脚步。1933年,闽西苏区首支妇女篮球队组建,极大推动了全苏区的青年劳动妇女加强体育锻炼,为参加战争做好准备。^[2]

在党红色思想的影响下,妇女体育经历了从自发性到军事化的转变。以体育为手段,分“前线”与“后卫”双模式混合教学,“前线”军事体育训练包括战术步法、射击、刺杀、劈刀、投弹、障碍跑等;“后卫”则大多以辅助军事部队为主,例如信息通讯、扫雷、放哨、卫生纪律、文艺汇演、游艺组织等。同时,这些妇女还承担着教育宣传工作,深入偏远山区,传播革命的火种,在工作结束后的时间自发地进行跑步、徒步登山、障碍越野等一系列难度的训练,体现出了苏区妇女吃苦耐劳、敢为男儿先的思想精神。^[3]

妇女体育实践对当时政治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有组织、有纪律的妇女在众多体育团体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当时的闽西苏区乃至中央苏区群众树立了榜样、发挥了模范作用。

3 闽西苏区红色体育文化实践价值探析

闽西苏区优良的红色文化底蕴与军民体育实践表明:革命时期的体育蕴含着锻炼群众身体、推动课程建设的工具性特征,以及救国强军、服务于民的政治性特征。随时代变迁,体育实践的形式与内容会有所不同,但其价值却永远不会消逝,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3.1 军事体育实践与国防教育目标相符合

“国防教育”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存亡,由各种具

有丰富内涵的社会活动所组成,体育便是其中之一。“国防体育”这一概念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为取得战争胜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政府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国防军事体育训练,使其迅速掌握各项作战技巧,成为国家军队的后备力量,“国防体育”这一概念在实践中一直使用到我国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4]

为战争服务,是革命时期闽西苏区开展体育实践活动的核心目的。在这一时期,将士的体育实践内容着重偏向战斗技巧,如劈刀、刺枪、投弹、射击等,突出强烈的斗争意识,以及部分卫生技能,如伤兵救援、物资运输、担架运输等。通过一系列有组织、有目的的军事化体育实践,培养红军战士在艰苦条件下的适应能力,增强红军战士在复杂环境下的作战能力,提升红军战士在落后环境下的自保能力。

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国情、文化传统、军事战略以及国防指导思想。国防体育是时代的产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以国家为主导、军队为骨干、社会为课堂的体育教育,更强调务实性和针对性。1902年蔡锷曾以奋翮生的笔名在《军国民篇》中提出“军人之知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质,不独限之从戎者”,认为“凡全国国民,皆亦具有之”^[5],意指要扩充军人教育于学校和社会。2001年4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同年8月,我国将每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六设为中国国防教育日。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规定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

闽西苏区时期的军事红色体育文化实践广泛深入、一直坚持、贯穿一生的长期性,抵御侵略、维护主权、镇压敌对的阶级性,形式广泛、对象不同、内容丰富的多样性,普及加强、全民参与、共同承担的强制性等特征,与国防教育贯彻全民参与、长期坚持、讲求实效的方针相呼应,对根植学生诚信爱国的品德、塑造青少年坚韧刚毅的品质、培育群众使命担当的品格起着引领作用,其价值与当代国防教育目标相符合。

3.2 学校体育实践与立德树人目标相契合

立德强调的是人的思想品德的培养和价值观的塑造,树人强调的是对人的知识技能的培养和训练,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6]

为推动学校体育发展,革命时期的闽西苏区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学校体育法规,对初、高级小学开设的

体育课程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例如算术赛跑、拿旗竞走、伤员营救等军队独特的体育教学手段,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学生的军事作战技能,并常开展如冲破困难、要团结、最勇敢的战士等红色革命趣味浓的体育竞争游戏,丰富学生体育教学内容的同时,培植学生的责任担当、增进学生的团结协作。在物资匮乏、体育教学器材难以得到补充的条件下,鼓励师生共同参与体育器材的制作,如担架、独轮车、沙袋木马、练武桩等简易器材,一方面锻炼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另一方面培养学生自力更生、迎难而上的思想品德。

中华民族是以教育为首、立德先行的民族。党的十八大以来,将教育作为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之首,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进一步丰富了人才培养的深刻内涵。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发挥教育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2021年6月,教育部制定了《〈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试行)》并提出:合理选择多元化教学模式和多样化组织方式,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更好地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当代学校体育教学要依托高效、高质量的教育载体,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良好品德,进一步推动立德树人目标的有效落实。闽西苏区时期的学校红色体育文化实践遗存于世的爱国精神、团结精神以及多样化的运动形式,不仅能提高当代学生对体育的兴趣与参与度,同时也能丰富学校体育的教学内涵,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与良好思想道德的培养具有正确的导向作用,其价值与学校体育工作中的立德树人目标相契合。

3.3 青少年体育实践与全面发展目标相切合

全面发展是促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是使其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前提保障。

革命时期的闽西苏区的青少年们除进行一些实战性强、难度高的体育训练外,还衍生出其他具有较高实操性的项目类别,如生产劳动、危机应对、应急求生等,深层次扩展青少年对体育实践的认知与运用,快速提升青少年战斗技巧。在空闲时间,闽西苏区还常进行政治、军事、文化娱乐等的学习活动,如露营、放哨、搭桥、游艺、宣传、音乐会、政治游戏等,消除劳

作与体育训练的疲劳,活跃身心健康。一方面,突出闽西苏区加强对优秀后备军事人才技能的培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闽西苏区高度重视青少年德、智、体、美、劳的协同发展。

少年强、青年强,则中国强,青少年体育发展是当代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工程之一。身心健康、体魄强壮的青少年是一个国家的生力军、一个民族的希望,意志坚定、充满活力的青少年是中华民族生命力旺盛的标志和实现中国梦的基础与保障。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南京青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强调:“少年强、青年强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思想品德、学习成绩、创新能力、动手能力,也包括身体健康、体魄强壮、体育精神。希望通过你们的精彩表现,带动全国广大青少年都积极投身体育锻炼,做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将来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材。”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强调:“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

青少年群体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朝气蓬勃的庞大群体,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是青少年成长阶段中,各方面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闽西苏区时期的青少年红色体育文化实践,其承载的普适性、探索性、军事性、竞技性、趣味性、合作性等特点,有利于推动全体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观与价值观,激发其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的求知精神,促进其身心各方面素质的健康发展,培育其面对困难时的开阔进取和情绪调节能力,加强其团队组织和集体协作能力,其价值与当代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目标相切合。

3.4 妇女体育实践与社会价值目标相贴合

家庭、职业、社会这三大生活领域支撑着人类社会的基本运行,妇女是社会生活的重要角色之一,妇女体育作为妇女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同样也需要在这三大领域中均衡发展。^[7]

闽西苏区开展妇女体育运动渊源较早。革命时期,政府高度关怀和重视妇女的社会地位,“身体解放、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是当时闽西苏区政府倡导的响亮口号,也是闽西苏区政府工作开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岩声》月刊的报道、《汀雷》报刊的宣传,缓解了社会对女性的偏见与歧视,使闽西苏区妇女从文盲中得到初步解放,认识到体育的价值,享有参与政治与受教育的权利。军事技能教学、战争技能演习等严

格的军事训练与游艺体育会、体育卫生、体育劳动等丰富的运动内容,进一步将女性从受压迫的封建状态中解脱出来,鼓舞广大妇女群众自觉、自愿、自发地投入到体育训练和竞赛中去,走向社会建设、投身革命斗争,实现妇女体育思维男子化、管理标准化、队伍军事化、能力竞技化的发展要求^[8]。

政策的保证、制度的支持、时代的需求在宏观层面构成了我国妇女体育发展的动力机制。^[8]1995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提出要重视妇女和老年人的体质与健康问题。2009年8月国务院公布的《全民健身条例》指出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应当结合自身特点,组织成员开展全民健身活动。2016年6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中指出妇女体育是全民健身发展重点之一。2019年8月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将妇女群体的体质健康干预列入战略目标。2021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中提到要推动农民、妇女等人群健身活动开展。

从“小家”到“大家”,闽西妇女体育的发展,昭示着妇女摆脱男权束缚,赋予女性相同的权利与义务,和男子一同投入保家卫国、振兴中华的事业斗争,为祖国、更为自己赢得尊重与荣誉。从“家庭人”到“国家人”,当代妇女体育的发展,推动着我国体育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投入、健身环境改善、社会关系和谐、民族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均衡、协调和全面发展,其价值与当代妇女体育社会价值目标相贴合。

4 建议

4.1 军事体育的“融合性”

闽西苏区红色体育文化实践具有很强烈的军事色彩和军事意义,既能提高国民体质,亦能增强国家安全防护能力。其实践与当代我国军事的协同发展有多种方式:(1)军体训练:其实践可以作为部分军事训练的内容,例如埋地雷、反托匪、伤兵救援、物资运输、坚壁清野等项目可以帮助提高军人的体能和技能。(2)军事比赛:其实践可以作为军事比赛的内容,如坚壁清野等,通过比赛的形式锻炼军人的体能和技能,提高军人的战斗力。(3)军民融合:其实践可以通过开展军民融合活动,将运动员与军队训练相结合,促进体育人才的培养,并为军队输送优秀的后备力量。

4.2 学校体育的“引导性”

体育是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时期闽西苏区红色体育文化实践融入学校体育,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闽西苏区体育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革命战争积蓄了有生力量。其实践与当代学校体育的“引导性”可以体现在:(1)丰富学生体育课程。如侦查、传信、救援任务等,既提高学生的体能水平和身体素质,又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2)培养青少年领袖意识。通过团体任务选拔小队长、小干部等方式,让他们在实践活动中承担责任,团结协作、锻炼领导才能。(3)根植学生军事素养。其实践往往伴随着历史和文化的背景,融入现代学校体育课,既引导学生从体育活动中了解和认识国家的历史和军事文化,又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

4.3 青少年体育的“传承性”

革命时期,闽西苏区红色体育文化实践凝聚了众多英雄的无私奉献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传承的接力棒,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和奋勇杀敌的无惧无畏精神。如何使其重要精神遗产在青少年中实现“传帮带”的作用,可以着力于:(1)红色元素的塑造。通过讲故事、看影片、阅书籍、观建筑等形式,向青少年传递红色体育文化的精神内涵和历史价值,引导他们从情感上认同和接受这种文化。(2)红色思想的贯彻。近年来许多校外红色研学基地配备了完善的体育场地和健身设施,并逐渐与学校取得合作,通过组织集体活动,如以红军长征为主题进行越野训练、以自力更生为背景的劳动主题教育等等,借以校内外联动的方式让青少年感受红色文化的力量。(3)红色意识的培养。引导青少年在重要的红色纪念日,如国庆节、建军节、学雷锋纪念日等,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如义务植树、义务清理环境等,让青少年在实践中体验红色文化中的奉献精神,或是开展红色主题的体育比赛,如足球小将、攀岩先锋等,激发青少年的爱国情感和集体荣誉感,实现红色品德心中记、红色血脉代代传。

4.4 妇女体育的“创新性”

革命时期,闽西苏区红色体育文化实践帮助妇女们树立了保家卫国的信念、忠诚严明的纪律和敢为人先的拼劲,如何将其实践与现代妇女运动结合起来,让妇女获得更多的锻炼机会和实现个人价值,可以通过以下方式:(1)多元团队体育项目。革命时期妇女参与的活动多为信息通讯、侦查救援、卫生纪律等方

面,这些项目可以根据女性特点进行改良,如将场地调整为室内与室外相结合或延长活动时长、任务早晚交替等来营造环境氛围,激发女性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2)引入现代健身元素。在传统的红色体育项目中引入现代健身元素,如在登山赛中加入手球对战或在侦查救援中增加攀岩环节等,满足女性的健身需求,促进女性的身体素质提升,增强女性的运动意识和自我调节能力。

5 结论

革命时期闽西苏区体育文化实践,无论是对当代的国防素质教育、学校文化灌输、青年意志培养或是妇女路线的开辟,都具有重要的探析价值。时代的需求与政策的支持,在宏观层面为研究闽西苏区体育的学者们提供了强大动力;在微观层面,我们应当推动广大研究学者深入闽西地方镇、村、街道,获取村民口耳相传的资料典故,深入挖掘早期体育实践活动,充分展现闽西苏区红色体育文化实践的力量与价值。

参考文献

- [1] 黄文宾. 红色体育文化的当代价值与实践路径[J]. 体育研究与教育, 2017, 32(5): 38-40.
- [2] 福建省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 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闽西苏区体育[M]. 漳州: 华安印刷厂, 1986.
- [3] 曾飙. 苏区体育资料选编(1929—1934)[M]. 合肥: 安徽体育史志编辑室, 1985.
- [4] 刘德佩. 论军事体育的概念及其特征[J]. 军事体育学报, 2013, 32(3): 35-38.
- [5] 中国近代鼓吹尚武的雄文——《军国民篇》[EB/OL]. (2018-08-18) [2022-03-20]. https://www.sohu.com/a/248633805_620255.
- [6] 邵天逸. “立德树人”背景下学校体育的育人价值[J]. 体育学刊, 2017, 24(4): 63-67.
- [7] 蒋永萍. “家国同构”与妇女性别角色的双重建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的国家与妇女[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2(1): 1-6.
- [8] 熊欢. 新中国妇女体育 70 年发展的社会动力与历史经验[J]. 体育科学, 2020, 40(7): 31-39.

[责任编辑 江国平]

(上接第 6 页)

- [17] WALID K. The FIFA rule of non-interference: how it contributes to corruption and how it contravenes kenyan law [D]. Nairobi (Kenya): Strathmore University, 2017: 34-35.
- [18]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treaty [EB/OL]. [2021-05-1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tual_legal_assistance_treaty.
- [19] 郑勇. 美国、瑞士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签订与内容[J]. 比较法研究, 1988(4): 61-63.
- [20] 王铁崖. 国际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5: 134.
- [21] LEARY M. Where should they go: why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have jurisdiction over those being charged in the FIFA corruption scandal[J]. Loyola of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2017, 40(1): 51-79.
- [22] 宋璇. 关于我国引渡制度的法律研究[J]. 法制博览, 2018(32): 227.

- [23] 李庆明. 论美国《外国人侵权法令》诉讼中的管辖权[J]. 美国研究, 2012, 26(1): 47-67.
- [24] 杜涛. 美国联邦法院司法管辖权的收缩及其启示[J]. 国际法研究, 2014(2): 82-95.
- [25] 谢望原. 域外刑事管辖权及其实现[J]. 法学论坛, 2000(1): 65-69.
- [26] AHMED. Why is the U. S. bringing down the hammer on FIFA? [EB/OL]. (2015-05-28) [2021-05-10]. <http://edition.cnn.com/2015/05/27/us/fifa-corruption-investigation-why/>.
- [27] 马呈元. 国际刑法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 204.
- [28] 任振朋, 李利利, 刘涛, 等.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国际足联腐败探究[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9, 34(3): 264-269.

[责任编辑 江国平]